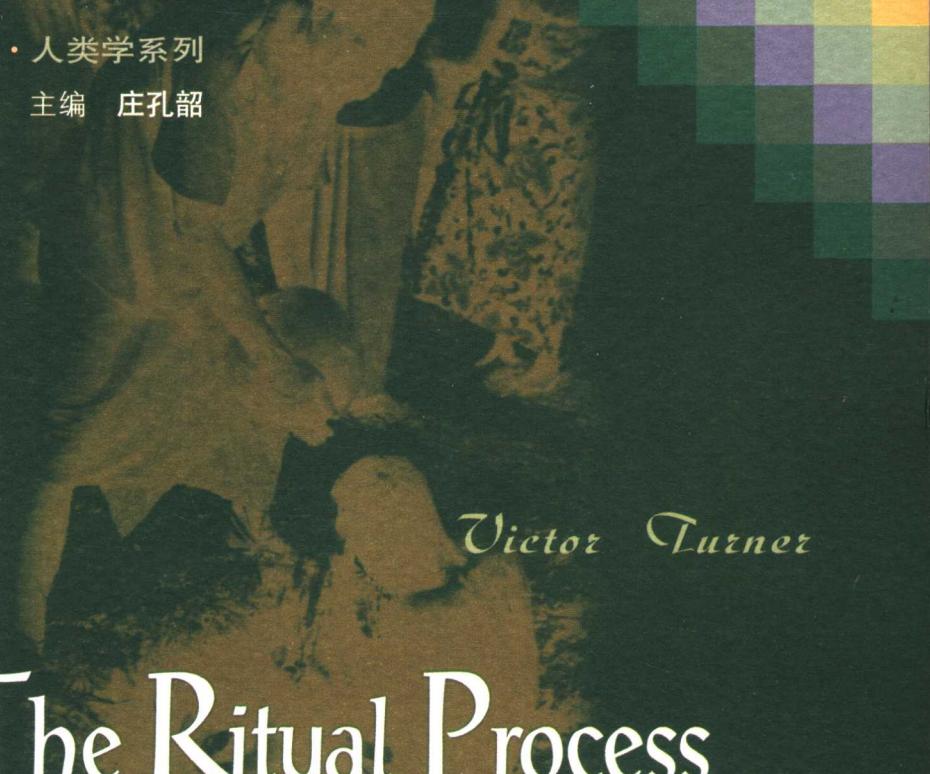


当代世界  
学术名著·人类学系列

主编 庄孔韶



Victor Turner

# The Ritual Process

##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 仪式过程

## 结构与反结构

维克多·特纳 著

黄剑波 柳博赟 译

 中国入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人类学系列

主编 庄孔韶

#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 仪式过程

结构与反结构

维克多·特纳 著 黄剑波 柳博赟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特纳著；黄剑波，柳博贊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人类学系列/庄孔韶主编)

ISBN 7-300-07153-8

I. 仪…

II. ①特… ②黄… ③柳…

III. 非洲原始宗教-宗教仪式-研究

IV. 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7159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人类学系列

主编 庄孔韶

### 仪式过程

结构与反结构

维克多·特纳 著

黄剑波 柳博贊 译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55×230 毫米 1/16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15.5 插页 2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18 000 定 价 30.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维克多·特纳（1920—1983）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当活跃和多产的人类学家。他在恢复人们对比较宗教学的兴趣及开创“符号人类学”的研究方面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是与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分庭抗礼的象征人类学家。

特纳于1920年出生于苏格兰。1950年4月离开罗得西亚－利文斯通社会学研究所（Rhodes-Livingstone Institute for Sociological Research）之后，他在曼彻斯特大学担任讲师职务，一直到1963年。不过他著述最丰的那几年是在美国度过的：最早是在斯坦福大学，然后在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最后是在弗吉尼亚大学。1983年他在弗吉尼亚大学逝世。其代表作有：《一个非洲社会的分裂与延续》（1957）、《符号森林》（1967）、《苦难的鼓声》（1968）、《仪式过程》（1969）、《戏剧、场和隐喻》（1974）等。

本书是人类学经典著作之一，堪与列维-斯特劳斯和伊里亚德的伟大作品同列。

在本书中，特纳通过在非洲恩丹布部落中的田野考察，将仪式在这个群体中的地位进行了诠释。特纳拓展了“阈限”与“交融”的概念，发展了传统的结构主义。与之同时代的范·杰内普、马克斯·韦伯、涂尔干等都曾经试图把所有的文化行为统一在超级结构里，提出涵盖全体的普遍化模式，特纳则突破了传统静态的社会结构的研究，把仪式放在运动的社会过程中加以考察，他把社会看作是交融与结构的辩证统一，从而有“分化—阈限—再整合”的过程，是结构与反结构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策划编辑 潘宇

责任编辑 陈玉生 翟江虹

封面设计 宁成春 范昊如

版式设计 王坤杰

#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我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多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本套丛书则旨在选译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我们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这套丛书拟按学科划分为若干个子系列，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将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的见仁见智，以及我们选择眼光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大学出版社

谨以此书纪念阿伦·洪博格  
(Allan Holmberg)

## 序 一

维克多·特纳（1920—1983）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师和学者，也是一位明星级的表演艺术家。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中，他在学术界这一充满活力的“马戏团”里，做出了杰出的表演。他能言善辩，谈吐中旁征博引，纵横捭阖，细致入微，听者常常被他震得目瞪口呆。特纳出身于苏格兰的一个戏剧世家（他的母亲是一位演员），有着模仿——有的时候甚至是引人发笑的模仿——他人举手投足以及面目表情的才能。他在谈话的时候，常常提到格拉斯哥，他童年的故乡。但他是在曼彻斯特大学作政治性著述的时候，才一方面接受了牛津、剑桥味十足的英式学术教育，另一方面还发展了他自己工人阶级式的谈吐方式。在曼彻斯特大学，他进一步深造，在戏剧化的自我表现（self-presentation）上有了变化。

有一些观点使初次涉足这一领域的人满怀期望，想看到一些极富个人魅力的表现，而这些观点特纳十分赞同。在做自我表现的时候，如果他觉得观众把这些看得过于严肃，他就会不断扮演插科打诨或滑稽逗乐的角色。他确实可以被看作一个学术界的杂耍艺人——但是这位杂耍艺人有本事与同样老道练达的人结下深厚的友谊，并且别人不用非得把他奉为先知或巨星。对于那些从群体经历（group experience）的现状提升出来的观点，他可以洋洋然自得其乐地欣赏并享受之，以至于他情愿扮演耽于宴乐的大师，也不愿作为老师或智者（guru）。

特纳最为深切关注的，就是有没有趣、好不好笑、开不开心。他在仪式中看到了“众神所做的工作”是如何进行的——但是“工作”的意思仅仅限于一个群体怎样发展出某些方式，来对共同的力量进行引导，

并为这种行为赋予道德的意义。就是如此，在有限制范围的社区中，比如赞比亚的恩丹布（Ndembu），众神所做的工作同样也包括对超越个人的力量的展示。他在世的时候所享有的盛誉主要是由他的公开讲座以及发表的讲座内容而来。然而对于最为了解特纳的人来说，他的声名主要是在美国的研讨会和小型会议中树立起来的。在这些场合，他可以与自己的同事和朋友相聚，满怀欢愉的心情来放松自己。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一直到 80 年代，他一直担当仪式主持人的角色，接待参与这些会议的众多社会批评家以及文化批评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特纳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攻读文学学士学位。在战时，他与伊迪丝（Edith）相识，并喜结连理，婚后他们生育了五个孩子。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十分亲密，特纳晚年的作品多为二人合力而著，即使有时在作者署名一栏，特纳夫人的名字不在其上，特纳仍然会称赞她，承认自己观点的发展是多蒙夫人的帮助。他们共同进行了许多次田野工作，特纳参加各个大型会议和研讨会时，他夫人曾多次陪同。

二战结束之后，特纳把工作的重心移到了人类学上，并在达利尔·福尔德（Darryl Forde）、梅尔·福蒂斯（Meyer Fortes）和雷蒙·弗斯（Raymond Firth）的指导下于 1949 年获得了人类学学士学位。他在曼彻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是他的导师。特纳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教师和作家，而这段教师生涯，他是在美国度过的。他曾经执教于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弗吉尼亚大学。

身为象征人类学之“泛大西洋民族志运动”的领头人之一，特纳从对文学与哲学（特别是语义学和结构主义这两个领域）的广泛阅读中，提取出来一些他的观察所得，并把这些所得作为基础对自己的研究主题加以阐明。他毕生的工作使得他能够对土著行为的复杂性进行深入的研究，记录下其丰富的内涵。不仅如此，他在记录之中所显露出来的深意，简直就是文学批评家在分析一部伟大的作品。未开化之民会为仪式器具及仪式手段赋予某些隐喻，而特纳常常是不假思索地把他们使用隐

喻的能力和复杂性与莎士比亚、布莱克这样的大家相提并论。当论及成长仪式 (initiation)、治疗仪式，或涉及社会地位提升的仪式等这些转换仪式 (rites of transformation) 的时候，他对文学的兴趣总是促使他把注意力聚焦在土著思维系统的细微之处，以及其互相矛盾的冲动之中。

身为一名探索者和评论家，特纳也到同时代的那些文化的诠释者那里去寻求对比——其中包括肯尼斯·波尔科 (Kenneth Burke)、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埃尔文·考夫曼 (Erving Goffman) 以及克利福德·格尔兹 (Clifford Geertz) 这些著名人物——尽管他对文化展现 (cultural display) 的动态细节的感触完全是出自他自己。文化在富于制度性的方式之中找到了最强烈的表达方式，他们要对此大加庆祝，而特纳分享了他们要庆祝的这一需要。

与其他一样，特纳在“表演” (performance) 这一生活的隐喻中——比如文学，比如戏剧，比如叙述故事，比如游戏，比如电影剧本或剧情，比如交响乐——发现了描述传统式的大规模的庆祝活动的方式。考夫曼从游戏规则或戏剧的维度 (dimension) 这两个方面对日常生活进行了分析；列维-斯特劳斯致力于通过交响乐的隐喻来解开神话传说的奥秘；格尔兹则断言，文学体裁式的结构分析占据最为领先地位，他越过了参与者本身来察看文化行为。而使特纳心动不已的，却是群体生活本身，即由参与者的亲自经历而表现出来的真实生活。使人类能够同欢笑、同哀哭的所有矛盾性特征也都在于此了。

与列维-斯特劳斯以及其他结构主义者一样，特纳也在寻求使特殊传统的动态活力与结合能力得到一次彻底的展现。而仪式与庆典所使用的语言为此提供了一扇大门，这扇大门能够通往真正的经历，而不仅仅是头脑中的储存或重拾往事的装备。如果说那些结构主义者的兴趣主要在于群体用何种方式，通过共同建立自己的文化结构，来获得秩序及意义，那么特纳所寻求的，就是把读者也纳入这种经历之中，尤其是涉及全范围的感官经历的时候，而这种感官经历能够在群体表达之中找到。

viii

与戴尔·希姆斯以及其他研究传播的民族志学者一样，特纳也涉足于对一些方式进行彻底的改变，而这些方式也许能够对社区本身做出最恰当的描述。对于那些争论说文化是由群体生活中全体认同的体系——亲属体系、物资交换、支配统治以及宗教信仰——构建而成的人，这一更为新颖的观点是从调查一个民族富于表现力的才智入手，来观察一致的思想以及经历是如何产生的。

从1950年到1954年，特纳一直住在恩丹布人中间，在此期间他参与了这些土著居民的日常生活，获得了许多一手资料，包括恩丹布人以当地语言表达的社会行为、经济行为、政治行为以及宗教行为。根据这一经历，特纳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其中以《仪式过程》最为著名。

特纳把内容丰富的民族志报告文学，与比较社会学、比较文学的感受与效果，极具特色地融合在了一起。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时候，特纳的读者群体就发展壮大，已远远超过了人类学家这一范围。《仪式过程》一书，最早是在1966年作为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的系列讲座的讲稿而写就，出版于1969年。出版当时，社会正陷于秩序不稳、战事持久的大动荡时期，整个西方世界的学生都在质疑：面对这种情形，教育还有什么实际意义？特纳富于预见地提出他的观点，把简单社会中“野蛮人的头脑”中的逆反性因素，甚至有时是颠覆性因素与当时激烈又有趣的政治现象联系在一起，为讲授文化的教师提供了根据，使之能够面对来自学生的责难，能够争辩学生的学习有其合理性。

政治运动愈演愈烈，街道上都随处可见。整整一代人沉迷于另类的生活方式，陶醉于公开选择将自己从社会中边缘化的做法。特纳对这一“非此亦非彼”的状态进行了讨论，这一讨论成为讲授与西方文明迥然不同的文化的方法，而在当时的美国，这一讨论是十分恰当与及时的。当时那一代人以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体验来达到教育的目的，而深切地经历其他文化这一做法，正是符合当时这一潮流的。

ix

特纳还发展了阿诺德·范·杰内普（Arnold van Gennep）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在杰内普的分析框架中，仪式的进程包括三个步骤：首

先，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分离（separation）。这其中所涉及的是从经过门槛状态（或 limen）过渡到一个仪式的世界里，而这个世界脱离了日常的时间与空间概念。其次，对导致分离状态的危机的某些层面制定一个模拟的情形。在这一过程中，对日常生活的结构的设定既受到阐明，又受到挑战（他把这些主题的重新出现称为“结构”与“反结构”）。再次，最终重新进入（reentry）日常生活的世界。在这三个主题之中，对于特纳所持的评论与描述的目的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模拟阶段（mimetic phase）。因为就是在这一阶段，通过含有颠覆社会性和逆反仪式性的行为，日常生活规范受到了最为首要的对抗。

事实上，特纳在对处于边缘社会的国家的分析中使用了一些术语，而这些术语被广泛使用，结果招致了那些恶意批评者的非难，说他是在混淆简单社会与复杂社会之间的重大区别。针对有些人所指出的，“阈限”（liminality）与“交融”（communitas）之类的概念过于笼统和抽象，特纳回应道，这些观点曾经帮助过许多民族志作者对他们的观察所得进行组织。不仅如此，他们提到的那些术语和概念也使文学评论家、艺术史学家、哲学家，以及社会历史学家对自己持有的材料中象征性的文化层面进行更为密切的关注。他还发展了一些关于其他场景的个案研究，而这些场景恰恰能够证明这些观点是有效的。特纳的追随者们也争先恐后地来为他辩护，拿出了许多研究的佐证。通过纳入特纳式的文化视角，这些针对不同文化场景的研究获得了更大的解释力。

与其他著作相比，《仪式过程》可以被称为是确立了特纳跻身于人类学理论家众多学术巨头之中的一部书。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些事件急切地盼望得到一个解释：既然无论哪一个对象人群都已经确定了身在社区中的意识，那么为什么他们彼此之间还会发生冲突？特纳的同事米哈伊尔·兹克申特米哈伊（Mihalyi Czikzentmihalyi）进行了一系列关于个人在游戏中的创造性状态的研究。基于这个研究，特纳在晚些时候把变化的存在状态描述为“流动体验”（flow experiences）。在通过流动体验而获得阈限的过程中，每一个参与仪式的人都会亲历一些即刻提升或逆转社会地位的行为，从而能够分享人们所能经历的事情，无论是

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样，反结构的范畴也可引入所有对抗性的行为之中，尤其是那些通过戴面具、改装扮、可预见的无序行为而为自己改头换面的做法。在特纳的诠释之中，以颠覆性力量为诱因的行为本身，就是文化的基石。因为在这些行为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的过程之中，产生了开放和改变的可能，而这种开放和改变的状态就是日后所称的“虚拟世界”(subjunctive worlds)。

特纳在发展自己的主张时，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在获得阈限的过程中，“经历分享”这一行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 20 世纪 60 年代的政治运动对特纳的这一思想作出了回应的话，作为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被改变的意识状态的学术转向就成为 70 年代起仪式研究中最具有吸引力之处。

特纳的研究并没有在学术话语的边缘徘徊，与之相反，特纳将自己置于社会思想的伟大传统之内，认为自己是致力于推动文化研究工作的一代英美同行之中的一分子。对于特纳的同行而言，他的论题主要是针对前一时代里程碑式的研究，即社会理论家的著作，其中包括埃米尔·涂尔干 (Émile Durkheim)、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英国结构功能民族志学者爱德华·伊文斯-普里查德 (Edward Evans-Pritchard) 和布洛尼斯劳·马林诺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但是最具重要意义的，是他对范·杰内普著作的阅读。范·杰内普起初被文化科学的主流所遗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英国和美洲的一代学者发现，这个人写的小册子竟然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众多人类学理论家的结构主义著作在精神上有着相通之处。

阿诺德·范·杰内普生前享誉甚少。他对文化现象的看法稍稍有别于埃米尔·涂尔干，而后者是当时法国社会科学界的泰斗。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国内才把转变仪式 (rites of transition) 的全局系统样式归到范·杰内普的名下。在那十年当中，一些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尤其显眼的是罗德尼·尼达姆 (Rodney Needham) 和维克多·特纳——在著作中把范·杰内普列在他们的学术谱系之中。范·杰内普对提升仪式 (elevation)、成长仪式 (initiation)、治疗仪式 (healing)、

融合仪式（incorporation）和超越仪式（transience）在结构上的相似性提出了一些认识，而特纳的任务一直是根据这些认识来表现这一系统是如何作为标志生命进程的方式，在他与之共同生活的人们之间生效的。

在包括《仪式过程》在内的一系列研究中，特纳对仪式在一个具体群体中的地位进行了诠释，这个群体就是恩丹布部落。范·杰内普及与他同时代的韦伯和涂尔干都曾经试图把所有的文化行为统一在一个超级结构里，提出涵盖全体的普遍化模式。而特纳针对同样的主题，根据具体的田野数据进行了论证。他以自己特殊的雄辩揭开了一个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信仰和行为系统的面纱，把读者带到了充满异国情调的族群（他就是在这一族群中开展了田野工作）中去，并以同时代的西方理念所用的语言对自己的经历做了诠释。这本著作体现了特纳知识方面的兴趣所在，不仅如此，它一出版就被看作一本十分特别与奇怪的书，在很多方面都是如此。但是在知识界它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因为它如此成功地把大陆理论与民族志报告的实践综合在了一起。

特纳改进了范·杰内普的三步过程理论，这一分离/阈限/重合（separation/liminality/reintegration）理论必须被进一步改进，以使仪式时刻在相对较为宽松和更加世俗化的社会里可供选择的余地更大些。他区分了“阈限”（liminal）和“近阈限”（liminoid）这两种不同的状态，前者是指在依靠仪式性分离才得以延续的群体中，仪式的操作方式；后者是指有更大选择余地的活动，而开放的社会中以这种活动为特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全球学术界飞速扩张的时代。各种基金会通过十分显眼的研讨会和公共讨论进行活动，打出自己的知名度。刚刚成立的或是得到资助的大学也是用这种方法使自己跻身于学术族谱之中。比如，罗彻斯特大学就通过建立并资助了刘易斯·亨利·摩尔根讲座（特纳的论文就是在那里第一次发表），理直气壮地要求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特纳并没有打算以公开露面的方式去追求特别的名声。与之相反，他选择了不甚出名的地方，以自己的名声为它提升知名度，在这些地

方，互动交流的时间会长一些，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够从彼此那里学到东西。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些高强度的活动之中。他在那些地方所结识的朋友恐怕对这些时刻本身记忆犹新，而日后发表的会议成果，他们倒是要淡忘了。

特纳有着表演的爱好，在这些场合他会扮演一些角色。无论是扮演小丑、梦呓者还是圣哲，无论是扮演李尔王还是傻瓜，他都会吼叫、痴笑，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还是一个怀疑论者，爱好神秘主义，在仪式导引者（他们可以在仪式性变革的重大经历里引领新手，却不会过分地专注于他们或自己）神秘的世界里，他最为游刃有余。他是一位出色的讲解者，活力十足的研讨会带领人和参与者，而且还会在生活中的重要短剧中充当一位精力充沛、有时还颇具个人魅力的演员。但对于与特纳私交很深的人而言，他们永远记得的是他那能引起别人深切关注的才干、富有深度的谈话，以及充满真诚的爱的人际关系。

罗杰·D·亚伯拉罕 (Roger D. Abrahams)

## 序 二

刘易斯·亨利·摩尔根自从罗彻斯特大学建立之初，就一直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去世之时，把自己的手稿、藏书和存款都捐献给了罗彻斯特大学，让该校用此来建立一所女子学院。一直到刘易斯·亨利·摩尔根讲座开始的时候，除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女生宿舍楼一角以外，学校里并没有一处为他所存留的纪念。

xiii  
这一系列的讲座能够开展，多亏当时多种有利情况交织在一起。1961年，约瑟夫·R·威尔逊和约瑟夫·C·威尔逊（Joseph R. and Joseph C. Wilson）家族向罗彻斯特大学捐赠，让该校把部分的捐赠用于部分社会科学。当时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系的主任伯纳德·S·康恩（Bernard S. Conn）教授提出了一个建议：开设这样的一系列讲座，对于这位伟大的人类学家来说，是与他相称的纪念，而且这一捐赠也是物尽其用了。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麦克柯里·哈兹列特（McCrea Hazlett）学院院长（后来成为大学教务长）、阿诺德·瑞文（Arnold Ravin）院长和考夫曼（R. J. Kaufmann）副院长的支持。讲座的细节是由康恩教授和他所属的系里边的教职员所制定的。

xiv  
最初的时候，对摩尔根讲座的时间安排是三个系列，一年一次，分1963、1964、1965三年，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就继续进行下去。在最开始的时候，大家认为每个系列的内容都应当聚焦于摩尔根的著作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他们这样想，是因为梅耶·福蒂斯（Meyer Fortes）教授在1963年所作的讲座就是专门针对“亲属关系”这一话题的，弗雷德·伊根（Fred Eggan）教授的讲座则把注意力集中在美洲印第安人上，而罗伯特·M·亚当斯（Robert M. Adams）教授的讲座

以都市社会为中心，来考察文明进程中一个特殊的方面。伊根教授和亚当斯教授的讲座内容于 1966 年发表，而福蒂斯教授的讲座内容稍晚于 1969 年发表。

特纳教授的讲座所考察的领域，摩尔根当时并没有广泛涉及，而在此后的修订本中，特纳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探索，比最初的时候走得更远。在已经完成的研究之中，他介绍了一套完整的研究内容和激动人心的探索成果。在这一过程中，特纳教授成功地抓住了摩尔根的研究方式的精髓，而摩尔根讲座致力于使之不朽的，正是这一精髓。

就像更早几年一样，特纳教授的来访总能提供许多机会，以使为数众多的教职员和学生共同进行非正式交流。所有曾经参与过的人都会幸福地回忆起特纳教授在那里的几年中，为系里的活动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正是以他起初的讲座为基础，本书才得以面世。这些讲座，特纳教授是从 1966 年 4 月 5 日至 14 日于罗彻斯特大学举行的。

阿尔弗雷德·哈里斯 (Alfred Harris)

罗彻斯特大学人类学系